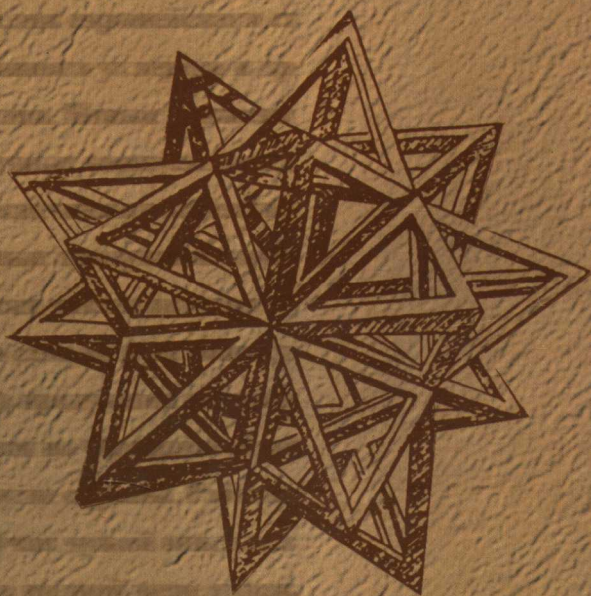


● 赵爱国
著

语言文化学论纲

ОЧЕРКИ ПО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语言文化学论纲

ОЧЕРКИ ПО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

赵爱国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文化学论纲/赵爱国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8

ISBN 7-207-07089-6

I. 语... II. 赵... III. 文化语言学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7831 号

责任编辑: 张晔明

封面设计: 于克广

语 言 文 化 学 论 纲
Yuyan Wenhua xue Lungang
赵爱国 著

出 版 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http://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bs@yeah. net](mailto: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省地质测绘印制中心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25

字 数 210 000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7089-6/H · 252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前 言

语言文化学是从原语言国情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它的形成至今只有 10 余年的历史。与国内汉语界研究的“文化语言学”相比,语言文化学不仅在理论渊源上与之不同,其学科形态也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如研究对象和范围就要比文化语言学宽广得多,目前已如呈现出语言学、文化学、交际学、认知心理学、语用学、符号学和应用语言学等七大方向,且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也比较独特,更加注重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认知心理和跨文化交际的阐释。因此,对它的研究有助于与汉语界的成果相互借鉴,以丰富和完善现有语言与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

本著作是在笔者多年研究语言文化学基础上写成的。它主要以 2003 年出版的《应用语言文化学概论》以及近 5 年多来本人在国内各种外语类核心期刊发表的 10 余篇相关理论性文章为基础,经过一年多的加工、整理和补充,最终形成了约 20 万字的书稿。它比较系统地对语言文化学的发展文脉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对该学科呈现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构建,并就其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评述和预测,旨在初步建立起该学科的理论构架和学理形态。

本著作共分为八章,内容涉及到当今语言文化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及其最前沿的若干课题,它们分别是:

第一章“语言文化学的理论渊源及学科定位”,主要论述了笔者对原语言国情学、语言与文化研究以及建立新型语言文化学的

几点思考,并对该学科的性质进行了论证;

第二章“语言文化学基本理论构架”,在与汉语文化语言学的基本理论作必要对比的基础上,阐述了作者对该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范围、学科任务、研究方法等的基本认识,并就该学科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术语进行了解释,以初步构建起语言文化学的理论框架;

第三章“语言世界图景理论及其研究”,论述了语言世界图景理论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并就该理论的哲学基础、语言世界图景与概念世界图景的关系、国内外对语言世界图景理论的研究现状等,进行了比较深入和系统的阐述和分析;

第四章“语言个性理论及其研究”,集中讨论和阐释了语言个性的概念内涵、语言个性的结构体系以及语言个性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并对语言个性与言语个性、交际个性的关系等进行了审视;

第五章“定型理论及其研究”,从认知空间、文化空间和跨文化言语交际等多重角度,讨论了思维定型、行为定型、文化定型、语言定型等的表现形式及概念内涵,并就定型的认知意义和文化意义作了深入的分析;

第六章“先例理论及其研究”,从先例概念入手,对先例文本、先例语句、先例情景和先例名的结构体系进行了构建,对先例现象的形成机理作了分析,并从认知心理和跨文化交际的双重视角对先例现象进行了语言文化学的阐释;

第七章“言语交际理论及其研究”,论证了言语交际作为语言文化学研究方向的可能性、必要性及意义,并就语言文化学视角的言语交际模式、跨文化言语交际的特点和俄汉言语交际的文化迁移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和系统的讨论;

第八章“语言文化学的应用研究”,在原《应用语言文化学概论》有关内容的基础上,集中就该应用研究的几个主要理论问

题——外语教学中的定型理论、跨文化交际的教育能力和意识、应用语言文化学的理论框架体系等,作了系统的论述和审视。

应该说,上述章节并没有涵盖语言文化学研究的全部领域,充其量只是该学科形态当前所呈现的主要方面,故为“论纲”。笔者近几年来相对感兴趣的这些课题,许多观点和看法还比较肤浅,有待作进一步的探讨,更期待学界的批评和争鸣。

在本著作撰写和出版过程中,得到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热情鼓励和帮助,也得到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大力支持,笔者在此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作 者

2006 年 7 月

于姑苏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语言文化学的理论渊源及学科定位	(1)
第一节 对语言国情学的哲学思考	(1)
第二节 对俄语语言与文化学科名称的思考	(6)
第三节 语言文化学的学科定位	(12)
第二章 语言文化学基本理论构架	(38)
第一节 语言文化学的哲学基础	(38)
第二节 语言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	(45)
第三节 语言文化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	(58)
第三章 语言世界图景理论及其研究	(75)
第一节 语言世界图景的概念及内涵	(75)
第二节 语言世界图景理论的哲学基础及学理形态	(79)
第三节 语言世界图景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84)
第四节 语言世界图景与观念/概念世界图景	(90)
第五节 语言世界图景理论的研究现状及发展前景	(99)
第四章 语言个性理论及其研究	(107)
第一节 语言个性的概念及内涵	(107)
第二节 语言个性理论的结构及其阐释	(113)

第三节	语言个性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119)
第五章	定型理论及其研究	(125)
第一节	定型的概念及内涵	(125)
第二节	文化空间的定型理论和研究	(130)
第三节	认知空间的定型理论和研究	(137)
第四节	俄汉言语交际中的民族文化定型	(145)
第六章	先例理论及其研究	(157)
第一节	先例和先例现象	(158)
第二节	认知心理视角的先例现象阐释	(167)
第三节	跨文化交际视角的先例现象阐释	(172)
第七章	言语交际理论及其研究	(181)
第一节	文化语言学视角的交际及交际模式	(182)
第二节	跨文化交际及其特点	(197)
第三节	俄汉言语交际中的文化迁移	(201)
第八章	语言文化学的应用研究	(216)
第一节	应用语言文化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217)
第二节	外语教学中的定型理论和研究	(225)
第三节	跨文化交际的教育能力和教育意识	(238)
第四节	应用语言文化学理论框架体系建构	(244)

第一章 语言文化学的理论渊源 及学科定位

作为语言与文化交叉学科的俄语“语言文化学”(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ведение),并不像我国汉语学界提出的“文化语言学”(культур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那样,从一开始就有定型称谓的,而是走过了自己特有的发展历程。从它目前所呈现的学科形态看,其理论渊源是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的语言国情学(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本章将对语言文化学理论渊源的演化和发展过程进行考察,并从学科建设角度对建立该新型学科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进行论证,在此基础上,尝试对该学科的性质、任务、研究对象和方法等作出必要的定位,以初步构建起俄语语言文化学的理论框架体系和学理形态。

第一节 对语言国情学的哲学思考

在世界语言学发展史上,语言与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其实早

在两个多世纪之前的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就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①,只是由于 20 世纪初结构主义语言学(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的兴起,才冲淡以至淹没了它应有的光环。因此,把语言与文化作为一门独立的理论体系或学科来命名并予以系统研究,直到 20 世纪 60—70 年代后才得以实现,其标志是前苏联对外俄语教学界兴起的“语言国情学”(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研究热,以及我国汉语学界,尤其是对外汉语教学界开展的“文化语言学”研究。

语言国情学理论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似乎孕育着不平凡的发展之路。一方面,它在学界的热切期盼中徐徐问世,引来众多学者的目光和关切,从而也导致了方方面面的评头论足;另一方面,该理论公认的两部代表作《语言与文化》(《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词的语言国情学理论》(《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слова》)在对本学科所下的定义中所显现出的矛盾性,又使得学界难以对其学科的性质作出科学的定位,于是,拥护者有之,怀疑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否定者也有之。应该说,某一理论的提出,如果能引起各方关注,其本身就说明有意义和价值,但如果对其科学性质缺乏准确和科学的定位,那必然会遭到学界的种种非议。请看《语言与文化》(1973、1976、1983 年版)的作者对语言国情学所下的定义:

语言国情学是对外俄语教学的一个方面,它为保障教学的交际性、解决普通教育和人文教育之任务,而在语言教学法上实现语言的载蓄功能,向教学对象进行文化

^① 欧洲文艺复兴(Просвещение)后不久,在德国哲学和语言学兴起的有关语言起源问题大讨论中,赫尔德(И. Г. Гердер)等学者就提出了语言与人、语言与人的本能相关的学说,该学说后来又经洪堡特(В. Гумбольдт)发展为“语言世界观”理论,这一理论从本质上讲就可以看作是语言与文化的相互关系论。

移入(介绍苏联现实生活中的典型现象),教学方法属语文教学性质,即通过俄语和在俄语学习过程中介绍国情知识。(Верещагин, Костомаров, 1983: 49)

1990年出版的该书最后一个版本对上述定义并没有做原则性改动,只是把“介绍苏联现实生活中的典型现象”这句原本放在括号里的解释词删掉了。可见,该定义在逻辑上是有缺陷的:一方面,它强调语言国情学“是对外俄语教学的一个方面”,可以理解为继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后的“第五方面”,也就是说,语言国情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与上述学科并列成为学生必须掌握的语言知识;另一方面,它又是一门教学法,旨在教学过程中向学生施行“文化移入”,相当于“语言教学论”(лингводидактика)中的一个部分。这一定义的双重性,曾引起学界很大的争议,也在客观上影响了该新型学科的健康发展。正如有学者评论所说,在20世纪80年代,语言国情学“这一术语的使用基本上有两大趋势:一是从与语言、言语、交际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任意现象中抽取文化信息的任何分析都可以解释为‘语言国情式的’;二是把文化因素纳入语言教学过程当中的任何实践”(吴国华、彭文钊,2001:191—209)。

现实也正是如此。从那个时期国内外发表的大量论文及出版的著作看,学界在20世纪70—80年代始终是把语言国情学当作语言学和教学论的分支同时对待的。因此,有学者就建议把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定名为“文化背景学”(俞约法,1994:272—299)、“国情语言学”(张中华,1993:37—45)、“语言国俗学”(王德春,1998:31—41)等。第一种显然属于教学论学科,或者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应用文化语言学”(俞约法,2005:71—93);后两种定名带有明显的语言学倾向,主要是研究语言中的“国俗语义”或

“民族文化语义”。学界在学科定名上的争议,足以从一个侧面证明该学科复杂的性质。

从20世纪90年代起,语言国情学研究出现了新的动向:一是学界不再局限于使用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这一术语,而在学术著述中比较多地开始使用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ведение 等新术语。^① 特别是1994年以来,后两种提法中的前一种渐有占上风的趋势;二是研究范围和方向有比较大的拓展,已不在局限于语言国情学所限定的“词汇背景知识”或“词语文化”的范围,而是向文化学、交际学、认知学或心理学等领域延伸。上述新动向的出现,有理由认为与前苏联的解体即现实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其“国情”(可理解为社会性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仍然使用“语言国情学”的学科称谓已经不合时宜,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前苏联的国情知识和现实,而采用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或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ведение 的术语似乎更为贴切和科学,因为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一词中的“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文化学)作为研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的学科,其内涵比“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国情学)更加广泛和深邃,也更符合该学科发展的方向。这应该是引起其称名变化的外在动因。除此之外,还应该有其更重要的内在原因,这就是学界同仁经过近20年的探索后,又重新回到起点上,对语言国情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进行缜密反思后得出的结论。这种反思是全方位的,具有哲学思考的性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思考之一:语言国情学究竟属于哪一个学科,是语言学的还是

^① 对该两个术语,目前学界的界说仍有分歧,多数学者认为是对同一学科的不同俄语表述,但笔者认为他们并不属于同一性质,前者表示的是一个学科,后者则是研究的领域,即可以分别界定为“语言文化学”和“语言与文化研究”。

教学论的? 它们的学科内部界限是什么? 就此 Ю. Е. Прохоров 曾尖锐地指出, 语言国情学“要么融入语文学, 要么作为对外俄语教学过程中的总的概念在语言学和教学法中找到自己的位子”才会有出路(Proхоров, 1998:17);

思考之二: 语言国情学奠基人提出的“词汇背景理论”的适用范围到底有多大? 或者说该理论在语义层面究竟具有多大的解释力? 俄罗斯的国情学词典编撰学专家就发现, 在依据该理论对词语进行释义时, 仅靠对语言单位蕴含的文化成分进行分析是不够的, 还必须加入某种百科知识的成分或内容;

思考之三: 语言国情学作为一种教学法, 如何与传统的国情学和文化教学进行区分? 对此, 《语言与文化》的作者曾在该书第三次再版时不得不再一次对“语言国情学”和“国情学”的概念进行界定, 明确指出该两门学科使用的语言材料具有“同源性”(гомогенность), 区别只是教授的方法不同: 前者用语文教学法, 后者则用社会学教学法。而在此之前的教学法文献中, 这两个术语实际上都是“疆界未定”的概念(俞约法, 1993:272—299)。也正如吴国华教授指出的, 那种直接把国情学素材纳入语言教学过程也绝不能算是“语文学方法论”(吴国华、彭文钊, 2001:191—209);

思考之四: 建立在“词汇背景理论”基础上的语言国情学究竟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具有文化背景知识的词语在语言中是有限的, 并带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 而这些词语的文化内涵一旦挖掘完后是否意味着该学科的终结呢?

思考之五: 语言中包含的文化内涵, 以及言语中蕴涵的民族意识和个体意识是用“国情”二字就可以囊括的吗? 文化与语言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是语言仅仅是文化的一部分这种单向的联系, 还是双向的? 语言体系本身是不是一种文化, 它对人认识世界

和被世界改造(即社会化)的过程中到底起到多大的作用?

思考之六:语言国情学的发展方向何在?语言与文化研究作为新兴边缘学科如何体现其应有的综合性和交叉性?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理论思维,使一时陷入困境中的语言国情学的发展获得了新的活力,学术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学科形态呈现出语言学、文化学、交际学、教学法等多方向、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发展趋势,学界先后提出了“语言世界图景”(языковая картина мира)、“语言个性”(языковая личность)、“语言定型”(языковой стереотип)、“民族文化定型”(национально - культурный стереотип)、“先例现象”(прецедентный феномен)等一系列新的理论,以及“民族个性”(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личность)、“民族意识”(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сознание)、“民族心智”(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ментальность)、“语言文化场”(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ое поле)、“语言信息单位”(логоэпистема)、“语言文化单位”(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рема)等新的观点和概念,为语言国情学发展成为新型的“语言文化学”奠定了学科基础。

第二节 对俄语语言与文化 学科名称的思考

我国俄语界对语言与文化进行系统研究,起始于80年代初引进前苏联对外俄语教学中的语言国情学理论,迄今已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①20多年的时间对一门新兴学科来说只是短暂的瞬

^① 以1980年王德春提出编写“国俗词典”的主张以及同年赵书涵在《辞书研究》第3期发表《国俗语言学词典》一文为起始时间计算。

间,可在从事此领域研究的广大同仁眼里却是艰辛的,也是辉煌的。仿佛就在这“瞬间”,我们经历了由初期的介绍、模仿(1980—1990)到中期的思考、探索(1990—1995)及后期的创建、创新(1995至今)等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无不浸透着我国老、中、青三代俄语工作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就在这“瞬间”,先后7次召开了全国性的俄语语言与文化研讨会,并有数百篇相关的学术论文和10余部学术专著竞相问世,从而为21世纪初的我国俄语研究筑起一道亮丽风景和学术高地,也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俄语语言与文化学科奠定了基石。^①我国学者对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所走过的发展历程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刘永红和杨仕章等在他们发表的《我国语言国情学研究十年简评》(1996)、《语言国情学在中国》(2003)论文中作了比较详尽的回顾和论述,2005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推出的《迈向21世纪的语言学》系列丛书中的《语言国情学》论文集,更是较系统地梳理和评述了该学科在我国的发展文脉,是对近20多年来我国在该领域研究成果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应该说,我国俄语界同仁为俄语语言与文化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尤以吴国华教授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学者的成果最为突出,受到国内外同行的瞩目。然而,当我们满怀丰收的喜悦昂首跨入新世纪的时候,

① 据不完全统计,20多年间我国俄语学者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语言与文化研究的论文不下500篇,仅专著就有10余部,它们是《语言与文化——俄语语言国情学概论》(顾亦谨、吴国华)、《俄语语言国情学》(谭林)、《文化词汇集》(吴国华)、《俄汉语言对比研究》(赵敏善)、《俄汉词汇对比研究》(许高渝)、《俄汉语言文化习俗探讨》(刘光准、黄苏华)、《文化语义学》(吴国华、杨喜昌)、《现代俄语与现代俄罗斯文化》(程家钧)、《九十年代俄语的变化与发展》(张会森)、《文化翻译学》(王秉钦)、《文化翻译论略》(杨仕章)、《应用语言文化学概论》(赵爱国、姜雅明)等,以及《语言文化问题探索》(吴国华)、《文化与语言》(王福祥、吴汉樱)、《语言国情学》(吴国华、杨仕章)论文集和《俄语文化背景知识词典》(吴国华)、《俄罗斯语言国情词典》(黄苏华、刘光准)、《俄语语言国情学——教与学探索》(季元龙)、《俄罗斯民俗文化知识词典》(杨仕章)等。

当我们把语言与文化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进行运作并每年一届招收攻读该方向研究生的时候,我们依然感到有几多困惑——蓦然回首间发现,该学科建设的学科名称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学界较为一致的确认。本节想就该问题谈谈个人粗浅的看法,以期与俄语界同仁商榷。

迄今为止,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究竟应冠以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名称,国内外学术界一直颇有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是继续沿用“语言国情学”,还是采用新的提法——“语言文化学”或“文化语言学”。我们认为,学科名称的界定是一件关系到学科正规化建设并确保其健康发展的大事,因此有必要通过讨论而取得广泛共识。

从该学科产生的历史背景看,前苏联对外俄语教学界最早使用的术语是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但从本章第一节中已经清楚地看到,该学科性质界定中的“双重性”和由此而产生的“矛盾性”应该说迄今仍然困扰着学界,也引起颇多争议。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学者的研究中出现了多种提法混用或并用的局面,时而用语言国情学,时而又用语言文化学或文化语言学,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也出现交替使用的情况。我们认为,学科名称的混用现象是很不正常的,也是有害的,因此有为其正名之必要。

为一门学科正名,应该说是十分重要的,尤其在我国更有其传统,自孔子起就十分重视正名,即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因为学科的正名,不同于对术语内容的界定,后者可以“百家争鸣”或“百花齐放”。如对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和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ведение 术语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就像人们对什么是 язык(语言)和 культура(文化)的术语可以下不同的定义一样,因为研究对象不同、角度不同、方法不同,就可能得出迥异的结论,而这种不同的结论并不会影响人们对“语言”和

“文化”概念的理解和研究。但学科名称的界定与术语的界定有着本质的区别,学术界普遍把“正名”看作是建立学科体系并保障该学科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名不正,则容易使人产生不解和误解,也容易使学科的发展“落入它途”,甚至会导致俄语研究中的“泛文化化”。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几乎在历届俄语语言与文化研讨会上都有人把普通语言学和教学法的论文当作语言与文化学科的命题进行宣读就是例证。这不能不说是由于该学科没有及时正名而产生的必然后果。

所谓正名,就是给俄语语言与文化的“研究范式”(парадигма)确定一个比较规范的并得到多数学者认同的学科名称,而且主要是汉语名称。因为俄语中该学科使用哪一个术语名称,说到底还是俄罗斯学者们的事。他们研究的视角、侧重点和方法不同,所使用的学科术语也就可以有异,事实也正是如此。如传统的主要研究俄语词汇中所含民族文化语义(национально-культурная семантика)的就称其为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而研究语言功能作用中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以揭示语言个性、语言世界图景及民族文化定型的则称其为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或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ведение 等。使用不同的俄语名称,“既反映其产生的时代背景的不同,也反映其研究范围和侧重点的不同”(吴国华,1999)。而在我国要把俄语语言与文化当作一门单独学科来进行运作,就不能像俄语那样起不同的名称,也不能简单地把俄语术语翻译成中文,而应根据我们自己的特点,尤其是所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确定一个统一的汉语名称。因为俄语中无论是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还是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或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ведение,实际上都可以界定和诠释为同一个汉语名称。也就是说,汉语中俄语语言与文化学科名称的俄语表述,完全可以使用上述三个俄语术语中的任何一个。